



章开沅 学术论著选

真学者都具有正直的学者家风，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糨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浮会之智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能无愧怍？

Z K Y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岳书系之六
Z K Y



章开沅
学术论著选

章开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开沅学术论著选/章开沅 著；章开沅 选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

(桂岳书系)

ISBN 7-5622-2133-2/C·38

I . 章… II . 章… III . 辛亥革命 - 研究 - 文集
IV . K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72991 号

ZHANGKAIYUAN XUESHU LUNZHU XUAN

章开沅学术论著选

◎章开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电话：027-8787624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李良明

封面设计：甘 英

责任校对：张 钟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5 字数：606 千字

版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装)：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二辑出版前记

桂 岳书系第一辑的出版工作得到校内专家的襄助和校外学术同行的支持，出版后海内外的校友和知音读者给予了热忱鼓励。曾在我校执教的阴法鲁先生表示愿意将他的著作列入此套丛书，已故的包鹭宾先生的三位女公子远道专程来汉，送来包先生的部分遗作。在此谨向各方面的师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二辑的编选早已着手，作者之间年龄差距较大，有的作者辞世已经数十年，著作的收集整理要费很大功夫，所以，这一辑将采取逐部推出的方式，而不是各部同时出版，序号与第一辑连续。与此同时，近期即将出版“韦

2 章开沅学术论著选

(卓民)译康德哲学名著研究系列”,并筹划出版《张舜徽文集》。这一系列的选题我们会持续开发,期望继续得到方家的批评指导。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

自序

对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桂岳丛书》，我曾全力给以支持。但轮到要把自己的文集纳入这套颇有影响的丛书，我却甚感惶愧与犹豫。虽然度过的学术生涯已有半个世纪，已出版的论著也不算很少，但究竟有多少可以而且值得流传呢？苏轼词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时间长流对学术成果的筛选，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有相似的经历，在40年代后期怀着理想主义与几分浪漫情调投身革命潮流，并因此而中辍了大学学业。古人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们却在没有完成自己学业的情况下便身不由己登上大学讲坛。在基

2 章开沅学术论著选

础与训练两方面都欠几分火候，这就是我们（特别是志趣未定如我）的先天不足之处。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我们主要是通过业余自学逐渐成长起来的。

最初的研究多半是结合教学中碰到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些是参与当时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如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太平天国的性质之类，谈不上什么系统深入的研究。自 1960 年以后，转向以辛亥革命的研究为重点，并且以撰写张謇传稿作为新的起步。1963 年以后，发表学术性文章渐多，而且也逐步摆脱了幼稚粗疏的弱点。然而好景不长，1964 年秋即以文字得祸，不仅遭到连续批判，连讲课和发表文章的权利也被剥夺。及至“文革”爆发，学术研究更无从谈起。

直到 1976 年“文革”即将结束之际，由于人民出版社林会椒编辑的热情鼓励与精心组织，我才得以与林增平、隗瀛涛、吴雁南等学者共同编写《辛亥革命史》这一大型学术专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万象更新，我和其他同行一样，意气风发，干劲倍增，多年的学术积累得以整理付梓问世，并且还不断有新的创获。文集中所收有关辛亥革命文章，大多写于这十多年。可以说，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而且从方法、视角、文风都体现出思想解放的痕迹。

80 年代中期以后，又转向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我的一生从不满足于轻车熟路，经常喜欢在荆莽崎岖的山野作新的追寻。从商会史到现代化，到教会史，都相继激发出我那永不枯竭的追求新知的热情。研究领域的不断转移，诚然使我个人的学业难以有所大成，然而促进一个又一个史学分支逐步形成，引导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青年学者登上史坛，却是我最大的赏心乐事。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没有理由忘记这个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落。教会大学本来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而现今的教会大学史研究更充满着跨文化的互动，我愿与中

外同行一道继续努力探索。

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正如采矿与冶金，如果没有努力发掘大批量新史料，则所谓开辟新领域只能流于空话连篇。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利用，从张謇未刊函稿、赵凤昌藏札到苏州商会档案，都留下自己艰苦求索的足迹。1979年以后，我对史料的追寻又从国内延展到海外，在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库、明治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新加坡大学图书馆，都有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收获。1990年赴美作长期研究以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更成为我研究教会史和教会大学史最重要的资源基地。我从来都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资料也应该为天下所共享，所以一贯把与世无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凡人们竞相谋求的热门资料，我大都离开得远远的，以避免不必要的人事纠纷。凡受到人们冷遇而又可能尚有价值的资料，我一定率先勘察，如有新的发现必定公诸同好，大家一起利用。这种做法极有成效，不仅我所到之处都备受欢迎，人们希望通过我的利用让他们珍藏多年的古老史料的价值为世人所知，而且有些单位和个人还不断主动向我们赠送大批珍贵资料，包括13所中国教会大学英文历史档案全宗的缩微胶卷，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与期待。文集中有些文章也或多或少记录了我在这方面的劳绩。

我常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却秉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目 录

自序	(1)
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1)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浅说	(18)
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28)
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	(36)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	(56)
八十年历史风云述评	(74)
治史偶感	(92)
时代·祖国·乡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一	(127)

2 章开沅学术论著述

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 75 周年	(149)
论辛亥国魂之陶铸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二	(166)
论 1903 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	(184)
《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	(208)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	
——以贝德士文献 (Bates papers) 为实证	(223)
“排满”平议——对辛亥前后民族主义的再认识	(252)
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1903 年的国内革命思潮	(280)
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	(303)
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	(326)
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	(336)
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	(364)
.....	(405)
菲律宾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菲律宾革命 100 周年	
.....	(423)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	(436)
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	(470)
同盟会会名探源	(478)
民元“争都”浅释	(486)
试论 1913 年的“二次革命”	(504)
论张勋复辟	(533)
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	(576)

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599)
孙中山与宫崎兄弟	(623)
宫崎寅藏与《革命评论》	(633)
对于张謇的再认识	(642)
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	(655)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	(673)
张謇与中法劝业银行	(697)
辛亥革命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 ——介绍部分张謇未刊函电	(708)
 附录	(720)
章开沅传略	(720)
章开沅著作及主要论文目录	(722)
 后记	(736)

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又复引起注意和讨论，这对于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因为，自从 1954 年胡绳倡导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 30 年。理应根据理论学习新的收获，科学研究新的成就，以及我们自身由于社会、政治阅历增长而有所提高的史识，对中国近代史全过程重新作一番总体考察。底下，也谈谈我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师友。

一

尽管出现了种种争论，但有一根本之点至今仍然为绝

大多数学者所坚信不疑，即：包括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以作为真正动力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为了澄清某些对于阶级斗争片面的、狭隘的误解，或许应该重温一下恩格斯在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时隔一个世纪，恩格斯这段话更加令人信服，因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世界各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文明史检验了这个规律，而且获得了许许多多辉煌的科学成果。

但是，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作为基本线索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历史中又各自有其千差万别的具体特点和表现形式。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决非简单地重复阶级斗争是基本线索这一人所共知的结论，而是应该着重探索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奴隶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封建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农民与地主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那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就很难作出这样简单明了的概括。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它既不同于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属于过渡型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因素新旧杂陈，流变不居，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因而大大增加了辨析条理基本线索的难度。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没有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譬如，大家经常引用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便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当然，毛泽东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有其他的论述，如从经济上谈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障碍，从政治思想上谈及向西方学习的几代人物，以及对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精辟分析等等。但相较之下，我总觉得不如有关“两个过程”概括得那么全面与精炼，而且它还可以把后面那些内容涵盖其中。当然，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写于抗日战争前期，上述“两个过程”又主要是为了强调我们民族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所以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表述似乎还有未尽之意。我想，如果把上述“两个过程”的文字改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也许会使人感到更为完整一些。

一提阶级斗争或“两个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些朋友就唯恐漏掉经济与文化，唯恐出现简单与片面的毛病。这种担心似有所据，但理解则未必准确。因为，过去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中之所以出现简单片面的毛病，主要是由于“左”的干扰，所谓“突出政治”、“抓纲上线”，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由于我们自己研究的局限，也容易产生对于“两个过程”比较狭隘的理解。总之，问题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本身，或者“两个过程”的提法是否不妥。我认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在表述上只能是本质性的高度提炼概括，它决不可能将各个时

期社会历史内容的各个方面缕陈无遗。作为阶级社会历史基本线索的阶级斗争，就其社会根源和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而言，自然可以包容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本文从一开始便特地引用恩格斯那段论述，就是为了强调需要对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作完整的理解，不能把它看成是游离于经济、文化之外的仅仅是涉及政治的暴力行动。

对于“两个过程”也应作如是观。“两个过程”作为阶级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具体体现，它也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自然是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史事的理论概括；“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何尝又只限于群众自发斗争、民族战争和革命运动，它同样也包容着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斗争。“两个过程”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它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历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很难设想，如果撇开“两个过程”，抽掉这个基本线索，怎么可能客观、准确、深刻地叙述和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停留于前人已有的结论，需要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包括对基本线索的理解）。认识永无止境。即令是业经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前人结论，也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复进行新的探索、剖析、验证，这样才可以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学科内容。

由于学力和精力两方面的限制，本文仅从民族运动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略作阐明，或可当作我对于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再认识。

二

纵观世界，几乎每个国家进入近代都曾经历过一次或大或小或显或晦的民族运动。有些是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有些是在某个先进的民族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又产生了国内若干“被排挤民族”起而反抗统治民族的民族运动，还有则是范围更为广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反对本国前资本主义落后统治结合起来的民族运动，一般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属于第三种类型。

列宁说：“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① 所谓“彻底战胜”，自然是指世界全体和整个时代而言，并非说任何国家、任何阶段的民族运动都能完成“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譬如在中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完成的，而且完成得比一般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更为彻底。因此，无论是就中国近代史整体着眼，或是仅仅就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着眼，西方模式都不能简单地搬用于东方。中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落后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各自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风貌，当然这也丝毫无损于上述列宁论断的普遍指导意义。

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因为，民族运动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物，因而也就体现了“两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可避免地激起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中国人民的反抗，也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引起与此相应的阶级结构和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变化，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运动逐步具有近代的特征。当然，从帝国主义本性而言，它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促使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体行动还是与封建主义相互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我们民族的每一点进步，都得经历多少次严酷的斗争，都得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①。何况这酒浆中还混杂着那么多苦涩的味道。在近代中国，不仅每一次民族战争，而且每一次农民战争，每一次革新和革命，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与反帝相联系，并且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对立物而存在。如果离开这个特点，简单地把中国近代史纳入英、法等国那种独立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衰亡的框架，是不可能如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

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以 1900 年为界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0 年以前，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有限，这个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而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力量是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和革新派，以及一部分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毋庸讳言，这一阶段的民族运动带有较多封建落后的因素。1900 年以后的民族运动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近代特征。尽管农民仍然是主要的社会基础，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日渐增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起了指导以至领导的作用。运动不仅包含更多近代内容，而且采取更多近代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5 页。